



传家宝

赵家园的两副对联

□沛然

其实，大可不必过度发挥状元的大名，银杏树千年葳蕤，又有两副对联的存世，足可彰显赵家园深厚的人文底蕴了。

赵家园位于如皋九华，那儿有棵千年银杏树，闻名遐迩。大树前方矗立起一对石刻对联。那是赵家祠堂的遗物，高两米多，字迹清晰可见：“百年慈孝光青史，千载恩荣沐紫宸。”数年前，石联重见天日，友人便欣然告知，并托我查阅史料，看赵家园赵家是否是大宋皇家族裔。

近来，我重阅赵家园《赵氏族谱》（民国本），方知赵家历史一二。“百年慈孝”真非虚言。赵家人尤重孝道，至孝者比比皆是。《赵氏族谱·祠范六则》前两则，都有说孝，解读孝悌的伦理价值：“勿忘春秋致祭，永孝思也。”“孝悌二者，经国之谟，实齐家之要也。”《张氏人暨朱氏行略》记载：赵渭滨与原配张孺人，皆为至孝之人。其夫其子先后逝世，张孺人求助族人，将赵麟过继为孙。宗祠年久失修、门庭倾塌，她积极捐资修建祠堂、保护家谱。她被誉为“巾幗丈夫”。在她的影响下，家人都坚守孝道，获得美名“一门三世，贞节昭昭，垂范千秋。”诸如此类的孝人传记，家谱所录甚多，不再赘笔。至于“千载恩荣”是否指两宋皇族，我认为尚乏证据。嘉庆丁卯年吴绍美作《赵氏族谱记》，写道：“或者曰：赵氏之先发祥天水，肇基洪都，其炎宋之支流余裔也。然谱稿起于康熙丙寅，谱叙定于乾隆庚申……鸟睹所为轶元明，而托始于宋者，岂非以其祖之所逮闻者为是，以今之所传闻者为非耶。若是则可以信今而传后矣。”

吴绍美记述当时有人认赵家园赵氏为皇室族裔，不过老谱中元明两代世系已失，只是假托于宋而已。赵家人赵鼎作《赵氏世系小引》，态度更为明确：“赵氏先代辽邈，无稽者不敢妄附。”《祭郑太安人文》等文记载，赵家不乏族人陆续受到朝廷的表彰，故言“恩荣沐紫宸”，亦无可。

一副石刻对联在外，一副木刻对联在内。在银杏树附近的一户人家，悬挂着一副木刻对联“舍南舍北皆春水，山鸟山花吾友于”，落款为“张耒”，刻印“通州张耒之印”。这家主人姓王，是招入赵家的。这副木刻对联是赵炯旧藏的。赵炯，字辉庭，赵氏第十七世族人，如皋南乡颇有名望的乡绅。他于地方教育是有贡献的。1925年，第8卷第5期《江苏省教育公报》刊出第782训令《令如皋县据该县镇海乡董赵炯呈解请释教育会会员籍贯问题》：令如皋县知事，案据该县镇海乡董赵炯呈称：窃本乡教育会屡因改选事宜发生客体，教员供职区内者有无选举权之问题。一方面谓选举权係属地主义，必须本区人对于本区之教育会有选人及被选之权。如他区、他县人员供职区内者，其时间至暂，关系不深，故不得有选举权。一方面谓选举权係属人主义，不限定本区人，凡区内任教者皆有选举权。综上二说，莫衷一是。查教育通令又无明文规定，会长马光镜因双方各执一词，无法解决，以致未能改选。经奉县委敬董协办改选事宜，敬董亦无成见，不敢冒昧从事，用特备文径呈厅长鉴核，恳请详加解释，迅示祇遵，以资进行而重选政，实为公便等情。据此，查教育会会员按照教育部修正教育会规程，并无籍贯之限制，既有会员资格，当然有选举又被选举权。据呈前情，合行令仰该知事转飭知照。此令。

“改选事宜”的确复杂。1924年7月1日，《民国日报》就已刊出一段新闻，如皋镇教育会于6月29日改选，薛自治当选会长，前任会长马光镜因堂弟马光汉落选，迟迟不办理移交工作。加上“属地主义”“属人主义”问题，赵炯才以乡绅名声出面，领头上书教育厅厅长，可见他的威望。

至于赵炯旧藏，可否断定此副对联就是张耒的赠品？2023年第2期《张耒研究》刊有《张耒与赵园楹联》，作者吴志强查阅家谱，发现赵炯妹妹为林梓举人陈其嘉（沙元炳好友）四儿媳，由此写道：赵炯在如皋南乡“是个头面人物，骑大马挎盒子枪，非常威武”，他邀请妹妹一家、张耒一家来赵家园踏春，欣赏银杏，参观祠堂。望着赵家园的美景，张耒情不自禁地写下那副对联，赠给赵炯。文末还不乏“鉴赏”：对联为集杜甫诗，“合起来虽不对仗，但表达意境为主，为张耒真迹无疑”。文中种种，无论评骘，或是细节，都有偏颇。

张耒出身状元，旧学造诣毋庸置疑。他所集杜甫诗为近体诗中的“流水对”，本就不考究语法意义上的对称，而是注重上下衔接，意境情趣的展现。上半句写春水，尚可联想起赵家园的银杏树，多变河道纵横。不过赵家园何处有山？下半句“山鸟山花”，显然不是九华的写照。此联可谓“寡联”，未有题字述及赵家园或赵炯。更为重要的是，《张耒日记》及其诗文中，也无相关佐证。还有一点，赵炯相比张耒、沙元炳、陈其嘉，明显是晚辈。张耒及夫人吴道愔会来赵家园看望一晚晚辈吗？为此我又请益赵鹏（研究张耒）、丁德全（研究吴道愔）两位地方文史专家，他俩也不知相关“故事”。下图：两副对联。



海安引进“洋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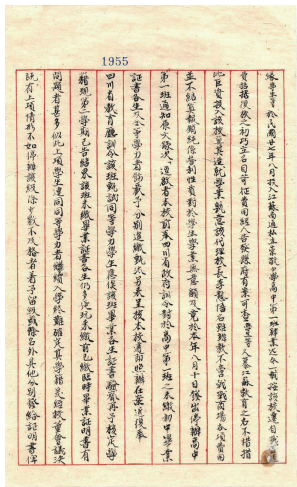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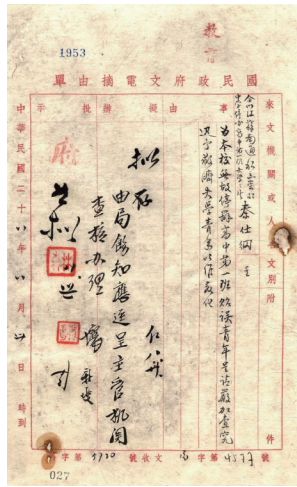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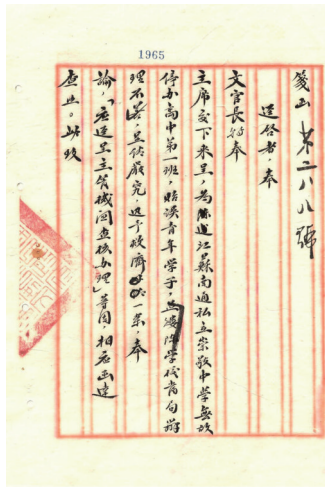
□程太和

最近，笔者看到一篇报道，主角是近几年从国外引进的优良鸭种——康贝尔鸭，这种鸭以耐粗饲、好管理、产蛋多深受广大养殖户欢迎。笔者认为，说此鸭是近几年从国外引进的就错了。

翻开1997年6月第1版《海安县志》，第231页有这样的记载：1982年4月海安县胡集乡畜牧兽医站引进卡基·康贝尔鸭，1983年5月又引进樱桃谷肉用鸭。这卡基·康贝尔鸭就是康贝尔鸭的一种。康贝尔鸭有3种：黑色康贝尔鸭、白色康贝尔鸭和卡基·康贝尔鸭（即黄褐色康贝尔鸭）。卡基·康贝尔鸭与海安里下河地区农民养殖的传统的高脚麻鸭基本相似。康贝尔鸭原产于英国，是世界著名的蛋鸭品种。由英国的康贝尔氏用印度跑鸭与康本地鸭杂交，其杂种再与鲁昂鸭及野鸭杂交，于上世纪初育成，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1984年春节过后，笔者赴胡集乡钟涵村十组调研农户家禽养殖、防治防疫以及家禽死亡率情况。当地鸡鸭养殖有着悠久的历史，钟涵村十组有10多户人家都是养殖的卡基·康贝尔鸭。而当时开办的群鸡、群鸭保险，对海安农村家禽养殖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对海安多种经营部门率先引进国外“洋鸭”品种也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本版投稿邮箱：csjy1000@163.com



合川崇敬中学史实补遗纠谬

□何美红

私立崇敬中学（今市实验中学前身）由顾徽基（字仲敬）创建于1917年，历经风雨洗礼，曾几易校址，不断发展。抗战期间，该校被迫停课，后又的通东的东社与泰县的姜堰短暂复课，此事已多有记载，但对崇敬中学在重庆合川办学一事却鲜为人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有关当年合川崇敬中学的一些细节变得更加清晰。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有必要对原有记述扩充补遗、考辨纠谬，以增添丰富的内容，使历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可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研究准备条件。

上图左起：1939年6月21日，朱光亚（前排左）在合川崇敬中学与第五宿舍的同学合影；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接林森交办函后，给秦仕纲等失学学生的回函（第1页）；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当年的办文单上批示签章；在重庆读书时的朱光亚（后）与大哥朱光庭（右）、二哥朱光鼐（左）；朱光亚等合川崇敬中学失学学生联名请愿书（第1页）。

崇敬在合川复校之遗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城区学校师生星散，各校也均告停办。在县教育局组织、各校教职员努力及地方各界等支持下，原有中等学校除敬儒初中、崇英女校外，其他各校都得以迁校复学。其中，崇敬校曾先后在三地复课：一是同年8月在渝北开始招生的合川崇敬中学。二是经代校长冯超（静伯）积极筹备，于是年9、10月间迁至余西区，借东社小学高级部教室重新开学，后因日军侵扰金沙而停办。三是1943年4月，经校董易剑楼（作霖）与冯超等人努力，崇敬中学在泰县姜堰复课，后于次年12月告停。

在南通，对于抗战时期崇敬中学的三次续办，有关重庆的那次鲜有提及，即使偶有记载也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但在重庆等地所刊涉及合川崇敬中学的记述中，不仅众口一词地认为是顾仲敬将学校迁到了合川，而且是师生随之同行（更夸张地说是“多数师生同行”）。但经寻访顾氏亲友，请教《南通市教育志》总纂孙模等人并查找各种资料，均无相关信息予以佐证。再查阅重庆方面有关合川崇敬中学的回忆文章等记述，该校学生以流亡青年和当地失学者为主，未见到任何南通学生信息。所以，确切地说，这是崇敬中学有关人员以其合法办学资质（获江苏省教育厅备案）在合川开办的一所学校。

现有史料显示，崇敬中学创办人、校长顾仲敬早在1936年就已赴沪休

息，由冯静伯代理校长，主持校务。抗战全面爆发后，其子顾而已（导演、电影艺术家）与赵丹等人参加救亡演剧第三队，从上海出发，一路西行，沿途进行抗日宣传演出。顾仲敬则随其子沿江而上，侨居重庆。虽无法查实顾而已达到重庆的准确时间，但从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当天（1938年2月18日），顾而已等冒险在国泰大戏院公演入川后的第一场话剧《民族万岁》的记载可知，顾仲敬在南通沦陷之前就已经到了重庆。

综合以上信息，虽然崇敬师生随顾仲敬迁校合川一说的可信度不高，但该校在此办学，应该与其有关。其实，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不可忽略，那就是合川崇敬中学校长李恕愔。

在1943年汪伪政府汇编某书中“淪方文化”之“淪方省外迁川中学”里，崇敬中学名列其中，校长为李恕愔，校名全称“江苏南通私立崇敬中学”，因该校校址位于重庆西北的合川县（今合川区），故通常称为合川崇敬中学。

关于李恕愔，笔者在编印于1934年的《江苏南通私立崇敬中学概览》“现任职教员一览表”中找到其信息：李生于1909年，重庆人，毕业于苏州中山体育专科学校，先后担任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一旅少校体育指挥官、江西四中体育指导。自1932年9月起受聘为崇敬中学专任教师，任体育教员、初二导师。另有史料显示，在崇敬中学于合川办学之初，李为代理校长。至此或能推定：合川崇敬中学的

设立，是在南通沦陷、李恕愔回到其原籍重庆之后积极推动或参与发起的结果。

朱光亚离校原因之谬

曾在合川崇敬中学就读的朱光亚是该校引以为豪的校友之一。朱光亚（1924—2011），湖北武汉人，著名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1938年夏，日寇逼近武汉，已经初中毕业的朱光亚跟随两个哥哥来到重庆，落脚合川，并与二哥朱光鼐一起入学开设于东岳庙的崇敬中学。然而，这兄弟俩仅在此就读一年，就离开该校，转学至江北县（今渝北区）新建的清华中学。对于他们离校的原因，不同版本的朱光亚传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以原新华社驻总装备部部分社社长奚启新的“因这个班存在学籍问题被学校解散”和作家徐鲁所说崇敬中学教师的“那一口苏北话，让朱光亚实在是难以听懂”而转学为主。对于前者，由于不见文献出处或史料佐证而不能确认。对于后者，因笔者所查到的合川崇敬中学教师均为当地人氏，加上前文所述“崇敬师生随顾迁校”的不可信，这个说法显然更值得怀疑。

直到笔者在不久前找到台北所谓“国史馆”的一组解密了的馆藏档案，才终于证实并丰富了奚启新的说法，同时也推翻了徐鲁对历史细节的想象。

这是合川崇敬中学高中第一班学生请愿团写给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的联名信，时间是1939年8月28日。通读这份长达9页（含签名等页）的信件可知，1938年8月，朱光亚等因“慕江苏教育之名……投入该校，冀其造就学业”，不料仅就读一年，奉四川省政府训令，学校突然于1939年8月10日发出停办高中第一班的通知，将朱光亚所在的这个班级解散。原来是这个班有许多学生因为无初中文凭（或具同等学力）而无法核定学籍，校方虽多次催促，然“未缴毕业证书各生，仍多延玩未缴”。迫于省府压力，“经校董会议决：既有上项情形，不如停办该级”，并对成绩及格者“分别发给证明书，俾各生得分头各谋出路”。

但该班学生均无法认可校方如此草率并造成全体失学的决定，除在请愿书中逐条驳斥停办理由外，还对校董会的程序、效力等提出质疑，为此联名呈请“国府严加查究，迅予救济失学青年，以肃奸究（按：指犯法作乱之人），而维教化”。未有秦仕纲（后人学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八期独立特科第三大队炮兵区队）与朱光亚、朱光鼐等原高一班全体32名学生的签名或签章等。

面对这份言辞激烈的请愿信，重庆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第一科科长江圣壤（志渡，浙江奉化人）初拟意见“应呈呈主管机关查核办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批示签章，文官处文书局随后按流程函告了秦仕纲等失学学生。然而，向国民政府主席的请愿终究未能改变这个班级被解散的命运。于是，无奈之下，朱光亚和二哥朱光鼐转学到江北县（今渝北区）新建的清华中学，继续他们的读书生活。

海复两座望稼楼

□田耀东



张耒给望稼楼的题联

1943年前，时属海复的地区有两座望稼楼。一座在海复镇公司街（胜利街）公济典当西隔壁，楼四层，砖木结构，坐北面南，1912年与自治公所同年建成，这座望稼楼在民间被称为“望海台”和“钟楼”，因它又是观测气候与潮汐的高台，故又名“候台”。另一座望稼楼在离海复镇东二里的通海垦牧公司内，此楼1902年建成，比海复镇望稼楼早建了十年。

民国的宋秉忠先生在1914年发表在学生月刊的《海复镇游记笔记》中记述的是位于海复镇的望稼楼。在这篇游记

中他记录了悬挂在望稼楼上的张耒题跋和张耒的题匾，又描写了登楼远眺的风光：登上候台……烟云缥缈，万里无涯，帆樯远影，出没云季……

海边四层的望稼楼，在当时已是很高的建筑。据海复镇老街人说，在望海台上可以看见“花地”（庄稼），看潮水、看“东海”里是否有海盗爬上来……平民百姓也可上楼观赏风光。

1911年3月，通海垦牧公司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大会通过张耒关于公司持续发展的提案，这年公司财政喜获丰收，结余白银三万八千零四十多两。同年9月，通海垦牧乡成立，办事机构定为“自治公所”。

张耒对建造自治公所特别重视。他对监造自治公所的工科生陈庭辅说：“墙高宽厚之分数为地工坚筑之分数，钟楼址尤宜慎。”涉及建造细节，张耒又说：“新砖必湿水，旧砖一横一纵，至多不得过二横一纵。泥中须和石灰十分之三，略和淡水青沙更好。化灰粉墙，须用淡水，灰须先泡使宿。”当年，海复的水质盐碱很重，咸水化石灰用于砌墙会影响墙体坚固，用它粉刷日后会爆皮。这些资深泥工才知道的细节，状元竟然都一清二楚。他还说：“柱礎须平直，檐须平齐，墙须平整。阶石外边须与栏檐上下为直线，勿伸出，勿缩进。檐（高）勿过三四寸，三寸为宜。古代衙门深似海——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檐）断。”

建成的自治公所有厚重的门楼，门楼后是三进二场心的四合院。门楼耸起四层楼高的古堡式建筑即为望稼楼。张耒为望稼楼题跋说：海复镇旧为滨海斥卤地，惟生青蒿……说他因防务和赈济的公务知有此地。后疏通塘蒿河，在蒿地港建了一座木桥，他四弟张耒在此筑堤垦牧，致使交通发达，田畴道路连片，佃户集居成市……并说这些都是江知源规划的。

望稼楼的得名来自马戴的诗：“望稼周田隔，登楼楚月生”。

望稼楼面南处置一口大钟，每小时报时一次，钟声传到四面八方。老街人根据钟声就知道海复小学要放学了，公司协理江知源要下班了。

江知源住宅在望稼楼东北二百五十米的江家宅，从自治公所东侧门沿着冬青树小路走过去更近。

1913年农历2月7日，张耒到大生二厂听经理人刘垣汇报工作，报告二厂余利17万的利好消息。第二天，刘垣把张耒应得的三千元红利交给张耒，张耒取二千元交给刘垣偿付他以往的负债，又取出二百元资助徐亮星，余八百元留为建常乐女校用。

在二厂稍作停留后，张耒又赶到海复镇视察，在2月10日登上望稼楼。那天，海复镇三里里街如长龙蜿蜒，电灯雪亮，红灯笼高挂；街上车水马龙，商贸繁荣。诸多喜事，张耒心情大好。海复镇边建设边营业近十年，用掉六万五千多两白银，终于成功了。

2月11日，张耒在自治公所望稼楼设宴，与同仁和各界人士痛饮庆功酒，酒酣淋漓，登高远眺。见南方田畴青葱，东方二堤、三堤土地成片，遂在望稼楼欣然挥笔题联：多把芳菲泛春酒，已见沧海变桑田。落款处小注为：亩庵集句题联望稼楼。

1906年，张耒任中国气象学会第一届名誉会长。为收集气象资料，张耒首先在垦牧公司望稼楼设有风速、雨量、温湿计等测试气候的先进仪器，并指派农科毕业生冒邦桢“专司测候，详记风雨、风力、寒暖、燥湿、潮湿”，所得气候资料“每星期与南通博物院测候处通讯”。1917年1月1日军山气象台投入使用，海复的两座望稼楼已经记录了详尽的黄海前沿的气候、潮汐资料，成为中国民间最早的气象观测站。

1918年7月27日，张耒又登上位于垦牧公司的望稼楼。那日云天万里，夕阳在西方树林中缓缓沉隐，斜晖脉脉，秋风瑟瑟，似有仙乐自天外飘来。站在高

高的望稼楼上，张耒悟人生与公司未来，感事怀人，挥笔写下《候台怀远》一诗：

落日千林隐，高台万里收。
东南无地垓，西北有云浮。
渺渺仙灵瑟，峨峨别院楼。
怀人无限感，风引白苹秋。

同年，张耒65周岁。

1926年，张耒逝世。张耒、江知源因时局动荡离开公司。大股东趁群龙无首，十年间两次分掉土地八万八千七百零七亩，致使收入锐减，各项事业经费骤增，至1935年负债总额达十五万八千六百元，只能靠出售资产度日。

张耒曾提及他创业成功离不开一兄一友二弟子：兄即张耒，友即沈敬夫，二弟子为江谦与江知源。1911年11月8日，张耒率四五百协防兵士接管南通清军大营，通电全国宣告通州光复，张耒任通州军政分府总司令长。张耒掌军，张耒掌实业，开创了南通地方自治新局面。

张耒曾说：“退庵（张耒）无弟，则创之势薄，亩庵（张耒）无兄，则助之力单。耒无咎无以致其深，咎无耒无以致其大。”

虽然通海垦牧公司的式微是时势所趋，但唇齿相依的兄弟和忠诚弟子被迫离公司而去，无疑加速了公司溃败的进程。

1942年，滨海大堤修复急需经费，自治公所与公济典当两处房屋地基及电厂等机器设备共售得三十多万元用以弥补亏空，是继分地以后又一次拆分公司资产。

海复镇一眼科医生与南新街染坊老板，以十万零六百大洋拍买得自治公所包括望稼楼在内及公济典当房屋一百间用以转手，当时，二十块大洋即可买得一亩地处肥沃的熟地。没有张耒的建镇，哪有民间资本的实力。

为防止日寇利用通海垦牧公司房屋驻军建碉堡，垦牧公司大部分房屋也在稍后拆除。海复镇东二里的望稼楼也随之消失。旧砖基石被周围村民挪作他用，仅余门楼一座到1975年拆除。

复原的通海垦牧公司在2022年11月18日对外开放。